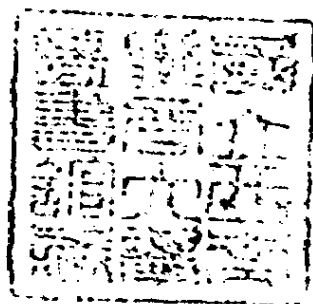


4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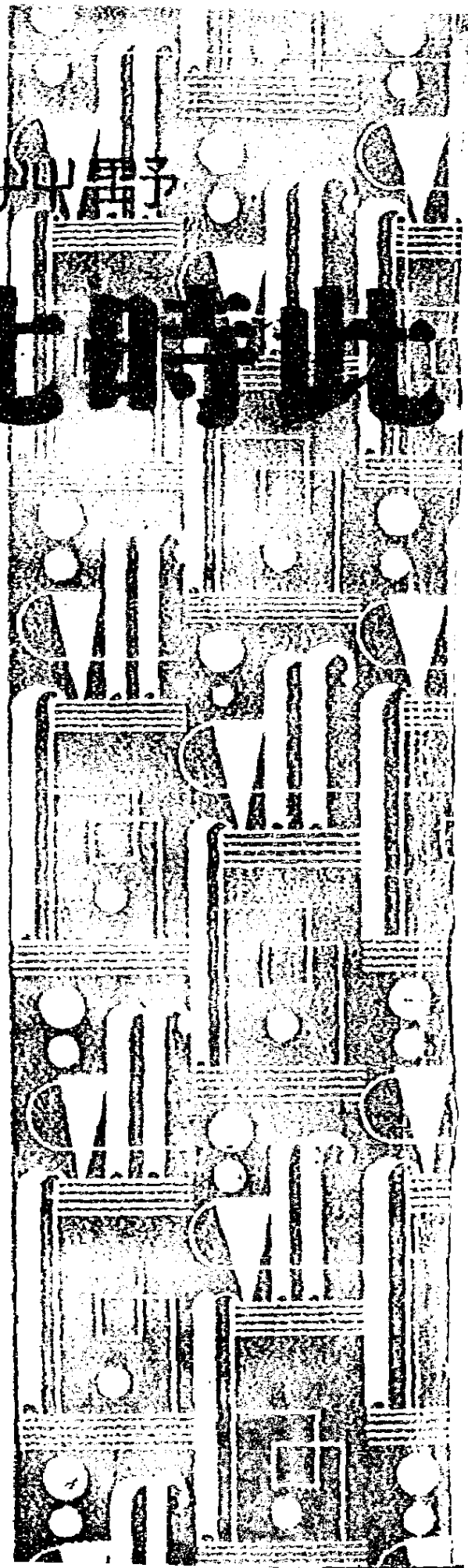
書譜

集地此時此

潛行夏



行印社版出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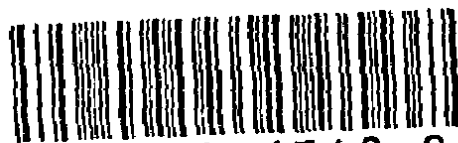


856.9
348-4
3

一之書叢草野

集地此時此

著 衍 夏



3 0614 6348 9

行發社版出獻文

月三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7069

目 錄

舊家的火葬	(一)
鏡自己	(六)
我這樣的寫了「心防」	(一七)
憶蕭耳	(二五)
少了一個說真話的人(悼孫寒冰先生)	(二六)
魯迅沒有看錯人	(二〇)
問題要分清楚	(二二)
顧七月	(二八)
關於佛山月報特輯	(三〇)
大個北喻	(三三)
彈論西苓	(三五)

鞍馬

(三七)

人鬼 (港報奇聞錄)

(四〇)

歐陽修

(四四)

從塔斯社消息說起

(四六)

學英國

(四九)

衡潭

(五〇)

掌聲與哀聲

(五二)

狗咬耗子

(五三)

錢謙益之辭

(五五)

錢謙益的根源

(五八)

蘇軾晚景

(六〇)

文人無「行」

(六二)

哀王開強

(六三)

舊家的火葬

半個月前，接到妻從上海寄來的信，說六月一日游擊隊打到杭州近郊，把我們的舊家放火燒了，因為那屋子被敵僞占領了之後，開了一所很大的藥廠，所以除出屋子全燒之外，還燒毀了敵人已經收買了的幾十萬元的藥子。妻在後面附加着說：「我們覺得很痛快，這最少對於你們沈家的那些不肖子弟，給了一個不小的教訓」。所謂不肖子弟，是指我的姪輩，他們一度逃出了之後又回到故居，將祖傳的屋子租給敵僞，過着準漢奸的日子。

在將信將疑中，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華發的一個電報：「浙東我某部，於五月卅一日晚潛入杭垣，當在太平門外與敵發生激戰，斃敵甚多，並將敵倉庫多所及安利，正大兩商行全部焚毀，一時烈焰熊熊，火光燭天，城內秩序大亂，是役敵除死傷外，損失三百萬元以上。」

消息是證實了，正大商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舊家，竟在這樣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樣，我也祇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這古舊的大屋子裏。那是一所五開面，而又有七進深的莊院。地點是在杭縣太平門嚴家街，離城三里，這屋子造於洪楊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時候，我們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說得毫不誇張，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經過了洪楊之劫，許多彫花的窗櫺之類是破損了，但是合抱的大圍柱，可以做一個網球場的大天井，依舊顯示着他昔日的面貌，我在這破舊而大得不得體的舊家，度過了十五個年頭。辛亥革命之後，我的哥哥因為窮困，幾次要把這屋子賣掉，但是在那時候竟找不着一個能夠賣下這大屋子的買主，哥哥喘了母親，從城裏帶一個人在估看，我祇聽見他們來討價還價，一會兒笑一會兒爭之後，哥哥憤憤地說：

「單靠這幾半塊兩半方的大灰磚，和五百幾十塊青石板，也非三千塊錢不可

西。

我才知道這些我日常在那裏翻掘起來捉灰螞蚱的方磚，也是這樣值錢的東西。

據母親說，這屋子是我們祖上「全盛時代」在鄉下建造了而不用了的「別邸」，本家住在長山門內的駝駱橋，這是每年春秋兩季下鄉祭祖時候用的臨時公館，而太平門不遠，就可以望見這座大屋子的高牆，那高得可怕的粉牆，將裏面住的「書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裏的老百姓們分開，所以不認識的人，祇要一間沈家，那一帶的人立刻就會知道：「啊，牆裏。」「牆裏」變了太平門外沈家的代名，據說已經是近百年以來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後，我們的家衰落到無法生存的田地，這屋子周圍的田地池塘，池塘都漸漸的給哥哥押賣了，祇有這屋子，却因為母親的反對，而保留着它破舊得像古廟一般的形態，夏天的黃昏會從蛀爛了的樓板裏飛出成千成萬的白蟻，沒人住的空房間裏也會白晝走出狐狸和鼯鼠，但是牆裏和牆外的差分，却因為「牆裏」人的日益窮困，而漸漸地撤廢了，牆外的野孩子們也做了我的朋友，

我記憶中也還鮮明地留著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籃子到鄉間去拾枯柴的圖畫。

假如我母親還在世，今年已經是八十三歲了，在那個時代裏，她算得是一個怪格奇特的人，四十五歲死了我父親之後，從不念過一句佛。從不燒過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丟在抽斗裏從來不去理會，不佞佛，當然不信耶穌，反對中醫，有什麼毛病專服西藥，從這種性格推衍開去，她是一個富於民主精神的人，她從不討厭鄰近的窮孩子到我家裏來，也從不禁止我和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東西省下來送給鄰近的窮人，是她唯一的愉悅，我長大了之後從日本或者上海回來，總帶給她一點糖菓和食品，但是她自己並不吃，瞞著我們偷偷的送給那些終年赤腳的孩子，被我們看見了的時候，她說：

「我們吃得太多了，這種東西，也許他們是一生也不會吃到的。」

但是，具有這種近代性格的人，對於這所古舊的屋子，她却懷抱著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戀與執著，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她鄭重地對我說：

「趁我活着，把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遲早會給你哥哥賣掉的。」

當時是五四之後，我根本就對這象徵封建的「破廟」有了反感，所以我對於他這心地保存了幾十年的財產簡直不加任何的考慮，隨口地說：

「我不要，讓他買去！」

這句話傷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從這時候離了「家」。「舊家」的影子在記憶裏漸漸的淡忘了，一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親病篤而趕回到這屋子的時候。

隨着時代的變遷，這舊家也有了幾度的滄桑，第一次歐戰之後，因為民族工業勃興，我哥哥也在這封建的屋子裏開過一個現代式的工廠，用新式的「機器」織杭紡，在「城外」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場」，浙江絲織業凋落了之後，「機器」停止了工作，於是這屋子在五年前又變了「正大繭廠」。那一年，因為哥哥要把母親臥房側面的「菓園」改作屯繭的倉庫，要把「裏園」的棗樹和橘子樹砍掉，他們之間曾引起過一次很大的衝突，但是結果是母親失敗了，我最後一次回家的時候，青蔥的棗樹園已經變了煞風景的「繭灶」了，我雖則不曾親耳聽見了

丁的伐木聲音，但是「櫻桃園」最後一場的主人公們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在鬥爭劇烈的時候，我屢次感到潛伏在我意識深底的一種要將我拖留在前一個階段的力量；我掙扎，我殘忍地研伐過我自己的過去，廉價的人道主義，犬儒式的潔癖，對於殘酷的鬥爭的忌避，這都是使我回想起那舊家又要使我惱怒於自己的事情，而現在，一把火把象徵着我意識底層之潛在力量的東西，完全地火葬了。將隔離了窮人的書香人家的牆，在烈火中燒毀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覺到一種擺脫了牽制一般的歡欣。

談 自 己

記得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裏面講起過被人擠稿之苦，他說：

「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

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暴擠出來的。他們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從這篇文章裏學了乖，我就已抱定了「少談自己」之旨，我向來濫寫文章，文不值錢，來擠者本已很少，所以我的少談自己，除出防擠之外，還有着我「自己」特有的原因，也許是幼年僻處鄉間，不懂社交的原故，我從小就怕「示衆」，小的時候偶爾穿了一件新衣，買了一雙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就儘可能的避開在人多的地方走動，年紀大了，也只想做一個不爲別人注意的常人；夾在人叢裏面。我不注意人，人不注意我，就覺得心安理得，暢適無比，從這種習性出發，在人多口雜的地方，我就儘可能的少作惹人注目的行爲，不發引人注意的議論，積習既久，遂成癖性，因爲自己只想一生平凡地做一點應做的事情，所以也

並不覺得這是非革除不可的弱點。

和我熟悉一點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個小小的信條：那就是宴會不猜拳，開會不講演。不猜拳的原因，是由於自己不會喝酒，別人耳熱酒酣的時候，自己老是靜靜地旁觀，於是發覺了猜拳當事者們筋突面紅，聲嘶力竭的表情，實在並不好看；而不講演的原因，除出不曾學過「演講術」，而又沒有即席措詞的才能之外，主要的還是害怕那百十雙一時集注在自己身上的眼睛。這是個人的性癖，「本」少談自己」之旨，就沒有在口頭和文字上發表之必要，那知不把這些習性使人周知，也有它弊害的一面。

幾個月來，爲這性癖，就受累不淺。

譬如說，一個相熟的或者不相識的朋友發來一個帖子，要你某月某日去參加一個集會，祇要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作爲一個新聞記者或者一個作者，理得去聽聽或者看看，可是一出席，便有被「指定」講話的危險，除出自己怕示衆的感觸之外，有時候這個會的性質不很知道，根本無從講起，有時候可講的話已被盡

和先講者說得「乾二淨」，隨聲附和，消耗別人時間，不如不說爲妙，於是祇能起立道謝，表示「沒有什麼意見」，可是，現在世事很複雜，人事很機微，在這複雜機微的人世中打圈子的人，神經又常會過分敏銳，於是「不表示意見」常常會此「不出席」更加不妙，「某次會上某人不肯講話」，這個「肯」字一用上去，就可以解釋做某人「不贊成」這個會乃至「反對」這個會的意思了。

改又改不好，逃又逃不掉，於是而我就能期待於年久月深，大家知道我的性癖，又那兒知道年未久月未深，不講話之外，不看戲又成了問題。

我喜歡看戲，而且是不擇好壞，電影話劇之外，舊劇也常常去看，但是，根據上述的性癖，對於話劇「預演」或者「招待參觀」請予指教之類，却還是常常謹謝不敏，理由還不很明白嗎？看完了戲之後，照例要團團坐下，在主席指名之下，一個個的起來「講幾句」——「吃豆腐」吧，我還不願意自欺欺人，單單找幾處缺點來「應景」而又不替他們想個補救之法吧，那麼上演之前非但對事無益而反足以徒使別人困擾，那麼即席替他們想個補救的辦法不好嗎？老實說，我

沒有這種時間和才能。

嚴肅話劇歌劇的發達，預演和「檢討會」之類也就多起來了，對於這種會合，我還是儘可能少去，這心情，正和魯迅先生所說「情同綁票，令我爲難」完全一樣。我於是採用了十年前在上海的環境下看電影的方法，遲去早退，悄悄的看完就走。在熱鬧場中掛了紅條子擠來擠去，有意使觀衆覺得你是一個特殊的人物，我固然沒有這種粗壯的神經，但是在衆人環視之下被主辦人請着讓着的坐到特定的席位裏去，似乎也有點跡近「海派」。我希望自由地，不必提心吊胆地觀賞，我也希望高興就看，厭倦就走。被讓到特別的席位裏坐定了之後，戲未完而先走，那不是更加失禮，更加容易引起誤會？——一直看到底吧，不幸的是在時間感覺不很銳敏的中國，我在對於時間方面非爭幾分幾秒不可的新聞工作上還有着一個站位。

不加說明，這種心情當然別人是不會知道的，於是災難就到來了，爲了不在特定的招待時間和特定的座席裏看朋友們主勢的戲，立刻就發生了毫不必要的猜

到，一個朋友留條給我說「昨今兩日未見來觀，惶慮之情，與時俱增」，而另一個朋友却在背後推測，說「是不是與主辦這演出的某先生有些意見」？「惶慮」何來？意見何自？這在我當然是「如墜五里霧中」，無從捉摸的了。

從這種瑣事想起，我就覺得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實在是從自己想得太多，替別人想得太少，換言之，就是不夠客觀，不夠民主；我想，以自己的習慣為唯一的習慣，以自己的性癖為唯一的性癖，以自己的看法，為人人皆然的想法，這是一件很值得「惶慮」的事情，從這種態度出發，主觀的好意，在受之者往往是一種不自由的拘束和苛責，為什麼不能大目觀之，讓他自由地來看，自由地不來看，自由地發表意見，自由地不發表意見呢？在中國鄉間來了一個衣裝稍稍不同一點的人就要論足評頭，追隨不放，而在倫敦則不論你黃人黑人，不論你穿十八世紀的古裝或者霍萊塢的時裝，誰也不來對你給以特殊的一瞥，這大概是——儘管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總也是有了幾世紀民主思想之積蓄的原故吧。

希望成英雄的人，把自己從人羣裏超顯出來也許有一種快感，可是願望做常

人的心裏，牠自己也表露出來，却還是一種苦痛，寫自己的文章並不愉快，我祇希望這篇文章可以有些微免疫的作用。

我這樣的寫了『心防』

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對於我變成一個可愛而又可惱的地方。不論離得多少遠，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總是那樣的強烈而鮮明，在這迢遙的山城裏，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傷，苦惱，她的憤恨，鬥爭……

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戲劇與文學」雜誌提出了一個「表現上海」的號召，那時候，我正計畫着寫兩個以上海為舞台的劇本，我響應這個號召，把計畫提前，在五月裏寫了「心防」。

也許是由於感情上的反撥，也許是由於計畫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說，由於三種三年來不斷地在心裏起伏着的對於在上海苦鬥着的朋友們的感慕與憂戚，我

把場面安放在鬥士們的一面。三年以來，由於我們劇作者的無私與勇敢，我們已經毫不遮掩地呈現了我們自己朋輩裏面的最醜惡的一面，「殘霧」裏的紅梅，「亂世男女」裏的大部分的角色，我們的筆力似乎都集中在對於一些人物的鞭笞，沈澱是泛起了，而對於沈澱以外的呢？除出公式的中央社電訊之外，我們的創作年代記上還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虛空。中國舊戲裏本來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丑，於是我想，假如拿沈澱腐朽來逗人哄笑的風氣繼續下去，恐怕幾年之後，在那些慣於籠統地用一兩個特例來概括其餘的人們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會定型成一個奇妙而醜怪的存在。我們不辭替我們的同時代人背了十字架遊行，但是我總對於在上海那種特殊環境下辛苦掙扎着的朋儕們終於是一種殘忍和褻瀆，我自量力地担負了這個填補空白的分工，我祇想說：「還有這樣的一面，還有這樣的一面！」工拙，是不計較了，我總算在空白上「塗鴉」了，留了一點墨漬。

因為這種原故，我所寫的便不能涉及上海文化鬥爭的全貌，這實在是遺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陽光下做人，有的在陰暗中做鬼，對於那些耗子的頭

目，我自問也還認識得清楚，過去十年中，到今天也許已經可以說，一部分精力還是支付在對於這些耗子的鬥爭裏面，這些惱人的小動物變化多端，神出鬼沒，一忽兒鑽進來，一忽兒逃出去，它躲藏在人們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齒，破壞着人們辛苦建造起來的東西：爲了中國要有進步的電影，從前我們就被劉呐鵬之流的耗子糾纏過四五年頭，去年五月在上海，馮執中之類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無恥的方法，破壞那用血汗凝聚起來的上海戲劇工作的基幹。記得在廣州聽到劉呐鵬附逆的消息，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我們要算舊賬」但是在「心防」對於這些耗子的描寫，終於輕輕地路過了。要不是約翰·斯坦培克已經搶先用了那個「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這魅人的書名，我真想也在這個題名之下，另寫一部人鼠之間的劇本。

一年來自己也覺得寫得太少；多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過來想，塗鴉終于勝過了空白，也許，我塗得使人看了不快。但是祇要有持久抗戰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的都能打勝，祇要誠懇地和要寫而該寫的戲劇

據門，門敗了也不失爲長期戰爭中的一次鍛鍊。差幸身心都還健康，性子也還不肯苟安于怠惰，凝視一下這作品之後，我仍將以拙劣的工具，忠實地去刻劃人生的嚴肅。

憶聶耳

聽到一個新作的歌曲而感到不滿的時候，我常常想起聶耳，看到一個街學的「音樂家」搬弄一套「理論」而企圖把音樂弄成神祕莫測的貴族藝術的時候，我常常想起聶耳，碰到一個「死抱住音樂」而只怪聽衆不懂他的「藝術」的「天才音樂家」的時候，我又常常想起聶耳，聶耳是一個不自命爲天才的天才，一個不將音樂當作法寶來嚇人的作曲者，也是一個不賣弄理論而實際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真理的藝術工作者。

我常常逗起回憶，一回憶的時候就使人更覺得這損失的難以補償，人們說，

他是這次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初的號手，我却以爲他所起的作用還要更本質一點，他在我們中華民族衰頹的乾涸了的血管裏面注射了適量的樟腦針和葡萄糖，而這強心和滋養的作用一直持久地延續到現在。

他替新中國的音樂運動開拓了一條正確的路，這是一條民衆音樂的路；不是「音樂貴族」們的「貴族音樂」的路，祇要中國革命是人民大衆的革命而不是少數貴族的革命，祇要我們創造中的新中國是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國，那麼一切企圖和時代逆行的「音樂理論」必然的會到它們應該去的地方去的，聾耳在中國民族的心中永生，被樹的蟬聲將會自斬於自己的愚昧與渺小！

少了一個說真話的人

悼孫寒冰先生

孫寒冰先生的死，我的感覺是好像在這喧鬧嘈雜的雜音裏面，突然的少去了一個渾渾亮亮壯大的聲音。在全中國嚮往真理，歡喜講真話，聽真話的人，是一個無可

補償的損失。

提起孫先生，人們就會想起「文摘」。「文摘」這本小小的雜誌，抗戰以來在報導國際真實，善導全國輿論這一點上盡了如何偉大的力量，我祇能說一句用慣了的話，無法可以估量，尤其是去年九月歐戰開始之後，對國際問題說一句真話，就會被人用卑劣的心思來猜測，對第二次歐戰性質的討論，對蘇聯出兵波蘭，對蘇芬戰爭，被有作用的外國通訊社弄模糊了心竅的人，一時差不多完全拒否了對於真實消息的攝取，對於這種不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而從殖民地宗主國的立場談話的人，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在言論界作了相當孤獨的鬥爭，而在這中間，「具有追求真理的熱和改善世界的誠」的「文摘」，變成我們渴求真理的讀者的友軍。孫先生是一個溫厚的學者，知名的教授，過去曾以「十教授」宣言的原故，也許曾被許多人認爲和政府非常接近，可是當他勇敢地爲着國家民族利益而站出來「介紹」世界真實的時候，連他也免不了許多無謂的攻擊，「文摘」六十八九期，「編者幾句話」裏，說「有人要求少登關於蘇聯的文章」，因

爲中國人只要聽中國話。甚至於有讀者向我抗議：『不要爲蘇聯宣傳。』這四週都表示得顯明在這次時代裏，講真話還是件如何困難的事情。蘇聯對建的微菌和帝國主義的鴉片損壞了腦筋的人，對真理還是如何的避忌與恐懼。我們這裏，即使是在前而引用進步的編輯者話，裏面也有沈痛而婉曲地說：『蘇聯是出於其前立。』我們選擇文章，除了能夠代表決定之旨的以外，凡是分析實際情勢的，我們決不猶豫者是世界名人而作選擇標準。我們必須另有可靠的事實作他們的意見的根據。即以蘇芬戰爭而論，現在戰爭已經結束，歐戰也終於擴大到新堪的納維亞半島。這些微細的事實，也足夠證明文摘對這個事件的看法的正確。我們有充分的可靠材料足以暴露這次戰爭的內幕，但其中有涉及我國友邦之處，在我國現在的國際條件下，是不能刊載的。在祇能從報紙上得到路透社、哈瓦斯、合衆社的消息的讀者，自然會發生上述的疑問。我們請求讀者信任我們，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是加劇地重大。」

「在祇能從報紙得到路透社、哈瓦斯、合衆社的消息的讀者」對真實消息發生懷疑，這一點我們祇該「知道責任的重大」，但是「幾世紀來受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地主人思想的毒，而有意地不愛聽真話和不准別人講真話的人」我們感到的抑半是憤怒，半是憐憫！「中國人祇愛聽中國話」，這一句話講得不錯，但是有多少人能講中國話？有多少人敢講中國話，今天還是一個疑問。寡聞的我，覺得被當作「中國話」而「愛聽」着的，祇是殖民地宗主國主子傳話人所講的「殖民地中國話」而已！

一個宏亮勇敢地講真的「中國話」的人，突然的從喧聲囂嚷的雜音中消失了！紀念說真話的人。最好的儀式應該是今後自己聽真話，講真話，——第一是不要強迫別人講奴隸擅長的假話！

魯迅沒有看錯人

陳西滢教授十月十三日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星期論文：「德義日同盟與中國」，他的論旨一方面是巧妙地替歐美「民主」國家開脫釀成此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責任，他方面主張中國加入英美陣線，把中國獨立自由的希望，寄託在英美勝利的身上。陳西滢先生是國內的「名教授」，大公報是國內素著聲譽的報章，因此而我們覺得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把我們不同意的見解公諸於讀者的必要。

對於造成這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原因，陳先生不曾加以檢討。但是對於過去英法對侵略國的一貫的綏靖政策，却認爲「不僅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多少原諒」，「因爲英國的敷衍（？）日本，並不是爲了要爭取好處，而是要避免禍害」，「禍害避免了沒有呢？陳先生沒有回答，九一八日寇侵略中國，英國爲了「避免禍

響也，阻止了中國請求制裁的發言，於是，中國人民的禍害是開端了，中國人民（高等華人除外）的禍害，從站在大英帝國之立場來觀察事物的人，當然不須要避免的，可是日本的侵華戰爭繼續擴大是不是也是英帝國在遠東利益的禍害呢？被迫着退出中國和香港星加坡威受威脅是不是英帝國的禍害呢？陳先生是一律「理解」而「原諒」了！

我們需要和竭力爭取英美做我們的友邦，這是我們的國策，抗戰三年以來，我們的對英外交並不是陳教授所說的「甯我負人，勿人負我」，而是「甯人負我，勿我負人」。這也是自其變的事實，可是，不論在怎樣的環境，我們還是要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我們的抗戰和現在英德爭霸是性質上根本不同的戰爭，所以我們主張對歐戰中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可是看！陳教授用下記的理由，將中國的加入英美，認為是「自然的陣勢」，他說：「我們不希望征服他國，統治其他民族，英美現在也是如此（！），我們愛好和平，英美人近來也愛好和平」，「所以德義日在一方面，中英美在另一方面，是最自然

的陣勢」爲什麼要主張這種「自然的陣勢」呢？陳教授接下去講得很明白，就是我們可以隨附驥尾，乘機取巧，做一知半解的勝利，不但中國可以迅速的爭取她的獨立自由。而且全世界的文明也可以保全了！——除出那種沒出息的希望沾他人之光的殖民地人根性不講，我們只想問一問陳先生所要保全的「文明」是怎樣的文明？這樣的勝利，二十年前是有過一次的，那時候，我們也曾經夢了戰的，可是獨立自由呢？巴黎和會不是決定了把青島和山東的權益移讓給日本嗎？文明呢？我們還不是在屈辱下度過了長期歲月嗎？老實說，中國人流了三年多的血，這些血是不能沒有代價的，支付了這大量的血的中國人，是不能再滿足次殖民地的地位和「文明」了！慘痛的歷史不能重演，中國是不能再安於殖民地的地位了！

記得幾個月前，大公報社論上非常公正地說明了蘇聯對於波羅的海諸國所採行動的合理與正當，九月三十日重慶文化座談會席上，馮煥章先生更明白地說明了「波羅的海諸小國的併入蘇聯正和抗戰成功之後朝鮮台灣等等被壓迫民族的要將歸入祖國一樣」，可是一平素對蘇聯不加研究而談虎色變的人（馮先生語）

却居然說出在去年英法蘇協定的不能成立，完全是由於英法的「道義感」？不容許他們以這些小國爲犧牲品」的欺人鬼話！有這種「道義感」的綏靖主義者，現在已經不能再在英國的內閣中安坐，而終於在驚聲的責難聲中隱退了，真想不到遠在中國，還有如此忠誠的「知己」！

十年前，魯迅先生沒有看錯了人！

問題要分清楚

我們在一天之內接到兩封同一性質的重慶航訊，報導了重慶市民火燒「木蘭從軍」的故事，愛國的狂熱，反漢奸憤怒，是值得欽佩而欣幸的，但是對於這件事的本身，我們却以爲問題要分清楚。

從上面兩篇報告所述，渝市市民火燒「木蘭從軍」，大致有了下列幾項原因：

(一)導演卜萬蒼已經降敵。

(二) 影片用的是日本底片。

(三) 新華公司有日本人的資本。

(四) 故事有問題。

(五) 這片子在淪陷區可以上映，甚至敵人推薦過。

在此，我想從一個曾經從事過近十年電影創作的工作人的見地，和根據我們所知道的上海電影界的實況，述一點所感。我再說一句：「問題應該分清」。

這裏面包含着三個問題，就是：

(一) 製作「木蘭從軍」這影片的公司是否漢奸？

(二) 製作這片子的導演是否漢奸？

(三) 製作這片子的劇作者是否漢奸？

對於第一項，據我所知道，新華公司和主持該公司的張善琨君似乎還不會墮落到這個程度。上海淪陷以後他們繼續在上海拍片，不把這重要的文化宣傳工作的生產工具搬到內地來，參加抗戰工作，這是不愛國的行爲，但是在這一點我們

倒並不想單以此苛責於一個從事從來就被人家看作並不怎樣高貴的經營「娛樂事業」的商人。張善琨交大畢業，有高等文化程度，但是不能積極參加神聖的抗戰工作，其心已不可諒，但是我們也要公正一點說，在上海許多製片家中，他還是一個想要避開和日寇合作的人。去年日寇要和他合作，硬把資本加入他的廠，他學了用洋商名義辦報的方法，將他所有的製片廠都掛了美商的招牌，這事件觸了日本人的怒，一時使他甚至於不敢出門，後來呢，大約是妥協了，這妥協的條件我們不知道，但情理中爲必有，因爲他的片子，可以在淪陷區上映。所以在第一點，我們相信新華沒有日本人的股本，不過因爲廠設在上海，和片子要以淪陷區爲地盤，所以和日本人一定有妥協。

第二項，卜萬蒼並不怎樣乾淨也是事實，漢口未淪陷，報章騰載，卜已參加日寇辦廠的坐談會，帶領日寇到影片公司去參觀，至於是否汪逆的執行委員，我們無法知道。

第三項，我們要注意，因爲電影是綜合藝術，編導不一定出於一個人，而且

導演也往往可以歪曲原作的劇本。在此我們要喚起同胞注意，這影片的作劇者是歐陽予倩先生。對於歐陽先生，我們大家知道和確信，是一個真純的愛國之士，他爲了「桃花扇」，遭受日寇壓迫，轉帳港桂，到現在還是老當益壯，從事於最切實的舊劇改進工作，這一點我們希望特別分清。同時，我還可以負責替歐陽先生聲明，「木蘭從軍」這一劇本的交給新華公司，在卜萬蒼降日之前，也是在新華公司與日本妥協之前，這一點相當重要，我們劇作者，決不替與敵人妥協了的製片人寫作劇本，但是以前「交貨」了的劇本事實上無可收回，這也是事實，而且製片公司常常粗製濫造，使劇作人蒙冤不自，也是事實。此中甘苦，不足爲局外人道。

至於對「木蘭從軍」原作上的指摘，我因爲不曾看過這片子，所以不敢妄參一語，但是如單憑上面通訊所說，我相信當日焚毀片子的羣衆多少的不無「遷怒」於作者的地方。譬如說挑撥漢蒙感情，這罪名未免太大，我們爲了環境關係，用歷史上的人物來借喻現在，難免有用「胡人」之類的名詞來影射敵人的地方。

這些祇要理智清明的人，我想祇該原諒作者的苦心，而不該將大帽子在別人頭上亂套，現在我們在求憲政的實施，我們希望大家「民主」一點。第三，說木蘭不該講戀愛，這也近於苛求，寫一個商業性質的劇本，劇作者何能免俗？況且我們從常情想，木蘭是人，戀愛也是人情所可有，這一點我們希望大家寬容一點，劇作者要呼籲有一點創作上想像上的自由。

寫得不少了，就此帶住。最後，我提出幾個問題，請求大家考慮：

(一) 希望政府當局從速全盤考慮電影生產工具和檢查工作，上海電影界不乏愛國之士，他們切盼着政府的領導。

(二) 希望各人多理解和多注意上海淪陷區的文化藝術工作，上海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極重要的文化中心，這孤島上還有五百萬不願為奴隸的熱望着祖國勝利的同胞，爲着對於這些同胞供給一些精神糧食，像電影這一樣的絕非祕密經營所能達成目的的事業，我們切望同胞們理解，在淪陷區中也可以長出蓮花，這中間不乏愛國志士，在堅苦中走着極困難的道路，所以，將上海電影全般抹煞

，認為漢奸作品，也是近於殘酷的武斷。

我們希望政府從速訂立一個上海香港製作電影在國內上映的檢查標準。

頌 七 月

在陽光下七月裏，光芒萬丈地綴着人類進步史上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七月四日，距今一百六十四年之前，美國的臨時國會發表了莊嚴的「獨立宣言」，爲着民族獨立，他們掙脫了殖民地的鎖鏈，勇敢地向世界呼喊：「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

七月十四日，距今一百五十一年之前，巴黎的市民打破了巴斯底監獄，法蘭西大革命是人類歷史從封建社會進步到民主政治的一個起程碑，他們用鮮血一般燦爛的字，將他們的口號大書在巴黎的城牆上：「自由，平等，博愛」。

七月十八日，距今四年前，西班牙瑪德里的市民和工人爲着反對弗朗哥的歌

叛民主，自動地武裝起來，開始了長期艱苦的反侵略，反法西斯，和保衛民主的戰爭，他們用血肉來阻止了使人類歷史逆行的叛黨，將瑪德里當作一個民主政治的象徵，他們喊出來的口號是：「不讓它通過」！

三年前，七月七日，在遠東大陸，經過了長期苦難的四萬五千萬人，掙脫了兩重三重的桎梏巨人似的挺起身來，勇敢地擔負起「七四」，「七一四」，「七一八」的三重使命，我們抗戰建國的目標是：

「民族獨立，爭取民主，反對侵略」！

不從這三重使命去紀念「七七」，就不會理解我們責任的重大，和戰鬥的光榮，對自己，我們要推翻一百年的殖民地壓迫，三千年的封建統治，對全世界，我們要打退法西斯的侵略，創造出新的民主。

七七，七七，第五個七七，我們的抗戰奠定勝利的基礎，而整個世界都到達了歷史的決算期了，在這次決算中，我們要在一次革命中，完成人類史上三個階段的工作，歷史不會倒退，民族命令：「團結，前進」。

我歌頌七月，是月的最輝煌的勝利屬於我們。

關於關山月畫展特輯

「文崗」在重慶中國畫作家喻關山月先生的畫展特輯，當天就跑到了一些不很有意義的閒話，我們不相信畫道中人會這樣優美，當時絲毫不會介意，今天我們又接到了一位署名「鍾」字的文崗愛讀者的來信，說這「是不該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我們感謝這位讀者的好意，但是對於鍾先生的惋惜，却還是不敢苟同。

「救亡日報」是一張以鞏固強化民族統一戰線為轉移的報紙，文崗是以鞏固文化界統一戰線為職志的副刊，所以祇要對於抗戰救亡運動有貢獻的文化工作，我們都不惜替他盡一點棉薄，對於新的如此，對於舊的也是如此，舊形式的詩，舊形式的畫，舊形式的小說，我們祇要他還有讀者，即使他已經在逐漸減少中心，那麼他就要在現在階段的人民文化生活中起輔助的作用，因此，我們對於這些

舊藝術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經不滿於過去的作風，而開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別要用友誼的態度來幫助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更進步。因為作風派別不同而先天的用一種嫌惡的態度來對付方才開始走向進步的人，現在似乎已經不是前進的文化工作者應有的事了。

關山月先生的畫，在新的、進步的畫家看來，當然還有許多值得商榷和批評的地方，但是他並不拒絕別人的批評，他還親自再三的對人說，「單講好話對我沒有好處，希望給我嚴正的批評」。所以我們以為將他的畫介紹給觀眾，在精神上對作者給以鼓勵，和對技術思想給作者以批評，不僅不背道而馳，而正是同時需要，記得去年關先生在香港開展覽會，中國在傾向上最前進，在技巧上最優秀的新畫家葉淺予張光宇……諸先生，都幫了他很多的忙，光宇替他編的特刊，篇幅也許要比數報的大上了幾倍，這一種友誼的鼓勵，我相信不僅消除了新舊畫家間的隔膜，而且對關先生的前進作了一個有力的推動；在這裏我必須提起就是當時新藝術家們一方面誠懇地替他幫忙，他方面卻沒有放棄了意識上或技術上的批評。

，祇有這種坦白而誠懇的批評才能使過去不屬於一個方向的作家接受，也是可以想像的事了。

在自下這樣的國內外情勢空前困難的時候，鞏固團結應該是每個前進文化工作者的責任，那麼對於一個剛從純藝術的畫室裏跑出來，要跑一跑戰地，描寫一下戰時人民生活的畫家，難道不該給以應有的（即使是稍稍過度了一點的）鼓勵？前進的人祇應該有一種更大的責任，而並不能要求有更多的權利，前進文化工作者誤認了自己的責任和地位，難道統一戰線不應該前進者去統後進者，而該由後進者來統前進者嗎？

我們不能同意「鮑」先生一般的看法，但是我們極希望有余所亞先生所發表一般的批評，因為批評不妨嚴格，而心地和態度都要坦白和民主。

一個比喻

——幾年前，對於進化學說和遺傳學說，蘇聯科學界掀起了一個熱烈的討論，去年十二月，在馬克思主義之旗下一雜誌召開過一次包羅全國科學界權威的討論會，結果，路易先珂教授所主張的關於淘汰及遺傳的學說，得到了絕大的勝利，這，是晚近科學界的一個重大的發見，也可以說，推翻了西歐正統的實驗遺傳學的形而上學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他的主張，簡易地說，就是他認為有機體的遺傳的基礎，不是永遠不變的東西，關與有機體之發達變化的，不單是生殖細胞及其構成部分，而是有機體及細胞之全體，在發達變化過程中，不單是有機體的特徵，就是遺傳的基礎，也蒙受外在變化的影響，因此，我們假如積極的創造出一定的外在條件，而積極地加以干涉，對於有機體之發達可以發生有效的影響，人力可以使這種發達適應於人類必要的方向，或者使之發生人類所希求的變種。

路易先珂從這理論出發，把秋時的麥種變成春秋二時，在蘇聯農產上作了當時代的改進，這個發見增加了人類對自然鬥爭的自信，同時也建立了一個將唯物辯證法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光輝的例證。即使是生物，有機體，人類積極地用一種一定的外在條件來影響他，干涉他，也可以使之轉回適應於人類要求之方向而變化的，這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事啊。

這使我想到藝術形式的問題，對於外來形式和民族形式的問題，發表意見的人很多了，但是除出郭沫若先生的一篇論文之外，討論似乎都偏於枝節而忘其根本，外來形式，不僅經過中國民族（人）的咀嚼，消化，甄別，吸收而必然的要變成中國自己的東西，即使一種根本上我們民族所沒有的形式，假如意識地以一種一定的外在條件來干涉他影響他，也必然的可以向着適應於我們民族方向變化發達，而成為我們自己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的是一個意志！使之成為民族形式，使之成為中國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

悼念西苓

在中國電影界人才寥落的時候，驟聽到西苓的死訊，真是一件哀寂的事情，特別是戰時需要新的幹部來創造，而這有力的藝術武器還被支配在模仿橫行，形式偏重的作風下面的現在。

中國有電影已經近三十年，而名符其實地可以說有了「中國電影」的那還是「九一八」以後的事情，電影工作的重要，已經屢屢被提出了，而「新」的文化人始終視這一領域的工作為畏途，戴白手套的「藝術家」望着這一被髒手捏着的武器搖頭，對於企圖從道髒手裏奪回這一武器的人們，暗中報之以輕蔑和惡意的冷笑。在舊人的排擠和新人的鄙視之下，極少數不怕醜態和不相信這一領域真是醜態到底的「文化人」突入了當時被叫做「黑暗圈」的電影場，在生活的泥濘中打滾，在惡意的荊棘中潛行，使中國電影能夠在十年中追上了二十年來的落後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時的辛酸與苦戰，在今天恐怕只有極少數當時親身經歷的人才能理解了，這極少數的中間，西苓是最初衝入這個圈子，而又是在這圈子裏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虐使與排擠的一個。

我認識西苓在一九二三，距今是十八年了，從他的西京美術學生時代，經過「藝術劇社」，「中華藝大」，「明星影片公司」，一直到抗戰爆發前一瞬的「榮寶」大公演，除出他在桂林的一個短時期之外，工作上有了不斷的關聯，因為相處日久，幸也許不幸，我知道了更多別人所不易知道的他的性癖和弱點。他在戲劇電影界的短短的十載生涯，是充滿了鬥爭和矛盾的歷史。在荊棘的道路上，他是一個勇敢的鬥士，但同時他更是一個徹底的弱者，爲了達成一個目的，他可以忍受有潔癖的文化人所絕對不能忍受的羞辱，但是他可以毫無抵抗地，接受足以使他整個計劃，陷於無法完成之讓步。他常常苦笑。這苦笑表示他的頑強，但同時也正表示他懦弱。他酷愛卓別林，而本質上却是一個甘地主義的信徒，他的藝業是一種以柔勝剛，以弱勝強的使剛者強者看了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的苦笑，而

他的人生哲學却是一種潛藏在不抵抗之深底的頑強的抵抗。

在泥濘中，他走了十年，也從這泥濘中，他生產了中國電影藝術上也許在一個短時期之內不會被人忘記的珠玉般的作品，從「上海二十四小時」，「船家女」到「十字街頭」，這是一個飛躍，可是當他用不抵抗和妥協壘積起來的「地位」好容易草奠基礎的時候，運命的惡戲便不容情的將他從世界上奪去了。

不單是爲了友情，在戲劇電影界寥落的時候，一個真真酷愛電影的「熟練工」的逝去，總覺得是一件難以排遣地使人哀寂的事情。

談 真

時人批評抗戰以後的劇作，常常惡意地用「抗戰八股」這幾個字來抹煞，「老是那一套，看厭了，又是漢奸，又是鬼子強姦婦女，又是民衆起來打死鬼子，殺死漢奸，千篇一律，厭了厭了」，這是所謂「批評家」的「一致」的呼聲。在這個呼

我們的劇作界起了兩種反響，一種是對於這種「非難」置之不理，依舊寫我的「那一套」，不去考慮一下為什麼他們「厭」，為什麼他們不歡喜「那一套」；另一種是教這種呼聲嚇倒，不暇思索這種非難的對不對，便立即改換方向，寫些與「抗戰無關」，——即使有關也「不過是裝飾」的東西，以為如此就可以免去「公式化」的譏評。這兩種做法，我們以為都不是使我們的抗戰戲劇走上正軌的辦法。

在我，以為「公式」並不怎樣可怕，也並不怎樣值得反對，抗戰中有的是漢奸，有的是日寇的姦殺，必然的也有的是民衆的起來掃除敵偽，這是現代中國大眾日日遭遇着，和還有繼續遭遇之可能的現實，也是民族革命戰爭中所必須經過的「公式」，那麼作家們拿這些現實的題材來寫劇本，毋甯說是應該。問題，是在對於日寇、漢奸、民衆乃至他們所處環境等等的寫得是否真實，而不在可不可以寫這些人物和故事，這些事可以發生在都市，可以發生在農村，可以發生在塞北，也可以發生在江南。日寇有各種的日寇，漢奸有各種的漢奸，民衆也有各種不等的民衆，寫得真實，是這麼一回事，觀衆便覺得真實而忘其爲公式，寫得

不真，不是這麼一回事，那麼即使不是公式，觀眾也覺得這不是人間現世之所可有，沒有日寇漢奸、民衆的劇本，難道就一定可以使人民不厭了嗎？這就是一個反證。

劇本要上演才顯現他的力量，他是要在大衆前面試驗的東西，因此更無法掩藏他不真實的缺點。抗戰劇爲着要振奮人心，寫得樂觀一點可以容恕，但這樂觀要有一個「可能」的限度，一個扭扭捏捏的洋場小姐爲着愛上一個抗戰的英雄而跑上戰場，這我們不能斷定她沒有這種可能，但是爲着溺愛這個女英雄而將她在戰場上的行爲描寫得比其他戰士更加堅定，更加勇敢，那麼這種描寫便會使人感到不是粉飾，就是欺騙，粉飾與欺騙，是不能博得觀眾喜愛的最大的原因。

藝術家不該騙人，這是常識。人民從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臭的，不論用怎樣的技巧，你不能在舞台上說是香，人民從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他是壞的，你不能在舞台上說他是好，即使是有從壞到好的可能，你也祇能告訴大家，如此如此之後，他才會改變過來，不要對他絕望，否則，壞蛋一抹面孔變成好人，觀眾必

然的會報之以倒彩而無疑。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爲了宣傳的目的，不是仰求少數人的贊許，而是博得大多數人的激動，最好是注意一下藝術的真實性」，這句話我有同感。

人、畜、鬼

——港報奇聞錄

害了重傷風躺在床上，無事可做，祇能看報，但是一看報便覺得「奇聞」太多，不能無感，於是熱退了之後起來節錄三條，以公同好。

其一、關於人

五月十五日香港「星島日報」載：

「英海軍機械員堅尼夫鄧勸布魯士（廿四歲）本年四月四日晨，在軒尼詩道駕駛汽車，因酒醉眼花輾斃男子林成芝（手車伕）以致被解控於高等法院正按察司麥基利哥堂，謂其犯誤殺罪，去星期五，各陪審員以六比二之數，謂

其罪名成立，麥司將案押候今晨宣判。開堂後麥司向主控之副政府律師馬菲曰：「律政司方面對於此案有何提議？」馬菲答曰：「余只知警察司方面，決意將被告之駕車牌照取銷而已。」官聆畢對被告曰：「週末本司將汝之案情，深爲考慮，汝今次受嚴格之審訊，當有永久與深刻之印象，本司可照例判汝入獄或科以罰款等等之懲戒，幸你之艦長力證汝品行良佳，同時本席以國家正在抗戰之秋，而汝負擔國家重要工作，故本司予汝機會，俾得繼續努力，關於馬菲律師之陳說，謂警察司取銷汝駕車牌照事，本席判汝罰款五百元，限期於六個月內繳交，除此以外，本司再不加其他刑罰云。

這條新聞的標題，是「麥司愛護戰時人材」，因爲愛護人材，所以對於輾斃手車夫的「誤殺罪」，警察司和麥司「深爲考慮」之後，就覺得祇要「受嚴格之審訊」而使之「有永久與深刻之印象」，就可以「再不加其他刑罰」，況且他還有「艦長力證」品行良佳」，輾斃人命祇不過「酒醉眼花」而已」。

「男子林成芝」的「國家（也）正在抗戰之秋」，但是他不能得到「愛護」，原因很

簡單，因為他祇能拉車，而不能「負擔國家重要工作」。

其二、關於畜

五月十四日同報：

「粵桂兩省政府，日前爲維持軍民需要，特通令各縣，禁止一切禽畜之可供食用者出口，本港居民數盈百萬，每日所需之牲畜爲數至多，而又絕鮮畜牧，端賴粵桂兩省運出廣州灣轉運來港供給，倘此令確實執行，則本港肉食來源，影響至大。記者爲此特分別向各有關方面，調查得悉粵桂兩省，雖有此禁令公佈，但仍不斷有禽畜由粵桂兩省運出廣州灣，轉運來港供給，短少時間內，將不致受若何影響。」

此文之奇，奇在「雖有此禁令公佈，但仍不斷有禽畜由粵桂兩省運出廣州灣」一句。中國常常被人稱爲「謎」的國，中國文字常常被人稱爲「謎」的文字，其妙就在這些地方。「雖……，但仍……」，這是一個中國作風的公式，「雖則抗戰」，但仍有妥協思想，「雖有討汪的言論，但仍有汪派的主張」，「雖則汽油已經統

制，但仍有女眷乘汽車招搖過市」，懂得這一公式，對於中國的事情便會恍然大悟，無師自通。

其三、關於鬼

五月十五日同報：有一篇日本評論家石九藤太論荷印問題的譯稿。其中一段：

「……位於第三生命線的前面和側面，形成一種障壁，與新加坡軍港同接第三生命線的，是荷印諸島。單以新加坡為據點的艦隊，對於第三生命線已有重大威脅，如果這些艦隊再掌握荷印，不管是××金棒……」

××，無疑的是「被檢」，讀報至此，始而疑，繼而悟，終乃大笑。因為已完全出於誤會和愚蠢的喜劇。

從前文推測，原文一定是「不啻鬼得金棒」，「鬼得金棒」是一句日本諺語，意思是「強者因此而益強」，日本文「鬼」字不作中國話的「鬼」字解，鬼字在日本是「強有力者」的意思，其中絕無侮辱之意。大概香港的新聞檢查官奉命敦睦邦交，所以一見鬼字，便認為有意侮辱，紅筆一勾，禍延「得」字，於是而變了「××」。

我想，這喜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鬼得金棒」，中國有一句現成的諺語：「如虎添翼」，假如譯成「虎」，我想檢查官一定會點頭稱善的。

林語堂先生回國，在香港與新聞記者談了一大段關於新聞檢查的笑話，他說：「戰時的輿論統制是應該的，但負責檢查的人員，應該是有學識有頭腦的，而不該是由中學生程度還沒有的充當，這樣一來，不要說時關笑話，更沒有了檢查的標準。」——我覺得關於「鬼」的檢查，是一個「鬧笑話」的例子。

感謝德萊塞

美國前總統胡佛，近來成了美國的「援芬」專家，在美國各州奔走呼號，組織團體，向各界人士要求捐款援助白色芬蘭，最近他又向美國各作家狄奧多·德萊塞募捐，這位有正義感的老作家忿然拒絕，還發表了一封答胡佛的公開信，說：「幾年來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有阿比西尼亞，中國，和西班牙，我從未聽見

過美國有錢人對他們有了什麼幫助。』最後加上一句：『我也從來不曾聽見過胡佛先生和他的同僚，計劃或者手過募捐救濟千百萬失業的美國同胞。』這封信，對胡佛實在太痛快了。

也許國人知道胡佛的歷史吧，他和中國的關係，決不淺於芬蘭，不，在他未當總統之前，青年的胡佛曾受過中國政府的任命，在天津當過工程師。他的父親在前清也和中國有過淵源，而前年我國抗戰開始，美國援華人士因為他和中國關係不淺，請他出來領導募款救濟中國難民，他一口拒絕，避之若浼，而現在，對於芬蘭，却是那樣的熱心奔走！我們本來絕不要求胡佛之類的同情，但是我們特別把這事提出來，爲的是從這件事，中國人可以知道，中日之戰和蘇芬之戰，在本質是一件如何不同的事了！

蘇芬戰爭開始的時候，咱們中國也有少數弄糊塗了頭腦的人，居然硬要把自己比做芬蘭，也在暗中大大地「援芬」了一陣，可憐啊，不論你怎樣賣力，美國有入不肯將你看作芬蘭，有什麼辦法呢？美國的飛機幾百幾百地運到芬蘭去了，給

我們的呢？出了高價錢買的還是用舊了的！

謝謝德萊塞，我們慶幸着在美國有這樣真心的友人。

從塔斯社消息說起

——代祝中蘇文協桂分會週年

因為我們有塔斯社的特電，所以讀者常常打電話或寫信來問，「某一個問題蘇聯方面作怎樣看法」？諸此之類，最近，接連收到三封信，都問我們為什麼最近塔斯社消息很少？這問題，我想倒可以在今天說一說。

我回答：塔斯社的消息並不少，也許可以說很多，但是，我們祇選登了很少的一部，為什麼？因為報篇幅小，國際消息多，大家要知道歐洲和遠東的戰局，而在這一時期之內，塔斯消息的大部，都報導了許多從我們現在的境遇看起來是「閑情逸致」的事情。舉個例，蘇聯和保加利亞的足球交歡，全蘇聯圍棋比賽，

學者們舉行國際空氣學節，畫家紀念水彩畫家雷平逝世十週年，如此之類，都占了很大的篇幅，這些消息，當然也有他的意義，但是在苦難中的中國人，總覺得似乎和目前的時局隔離得太遠了，因為我們在戰爭中，我們的篇幅要用於有關戰爭有關國際情勢的一切。

但是，說這樣的話，真是如何的使人感慨啊！全個世界在鼎沸中，全世界的人類在簷着塗炭流離之苦，而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地上，却過着那樣悠閑而幸福的生活！世界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在血戰，儘管心中有鬼，可是雙方都不敢批蘇聯的逆解了。德日義軍盟，甚至於破國際條約之先例，特別注明了和蘇聯無關。蘇聯，廿年前被列強圍攻過，剿伐過，罵做餓鬼國，看做野蠻人。而現在呢？蘇聯是名實相符的世界第一強國了，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也不敢侵犯蘇聯了，蘇聯之強，和德國之強是不同於一個類型的，德國靠人民的牛油來造槍砲，爲着侵略而犧牲了千萬人民的血肉；而蘇聯人民的生活，却一天天的愉快，一天天的舒適，一天天的安全了，這不是奇蹟，這祇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偉大而英明的領袖

史太林的賜與，事實是最大的雄辯。全世界上不乏巧妙的造謠專家，過去二十年來，爲着要在全世界奴隸們的心中種下一個蘇聯一定要崩潰的印象，造謠專家放送過一切種類的「消息」：饑荒，貧困，內亂，恐怖乃至一切祇有造謠專家才能空想出來的奇怪的傳說，可是現在呢？在真實前面，臆造的，空想的一切謠蔑，終已不復存在了，今天，還有勇敢的謠言專家來廣播蘇聯的謠言嗎？能說他內亂嗎？能說他飢荒嗎？對不起，整個世界在轟炸屠殺中，而站在競爭之外的，他們却在看足球，比圍棋了，却要開始搽一搽香水，聽一聽古典音樂了！歐洲有一句俗語：「最後笑的人才是真的笑」，現在是誰笑誰哭呢？要是托洛茲基有一點骨氣的話，我以爲，不被刺死，也早該愧死了！

歷史拖不轉來，真理瞞不過去，不論怎樣，蘇聯終於是勝利了。以此雜感，作爲中蘇文協桂林分會週歲的頌辭。

學 英 國

我說學英國，並不是開玩笑，英國的綏靖政策固然不必學，無從學，但是英國「以自國利益爲中心」的外交，却值得我們學一學。

譬如滇緬路，今年七月的封，和今年十月的放，完全是根據他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決定的，七月間，英國利於中日戰爭的結束，所以他徇日寇之要求，那樣軟弱地封鎖，十月間，英國利於中日戰爭的延長，於是他就不顧日寇的威脅，那樣大地開放，鎖的時候中國抗議，開的時候中國歡迎，這對於唐甯街不發什麼重大的影響，因爲他們的最高策略，是自己國家的利益。

陳西滢教授對於英國「心嚮往之」者當然已久，但是爲自己國家打算的精神却始終不曾學得，他所節得者，祇是替主家打算，替主家叫跳的一套看家本領而已。

前者是實利主義的「商人魂」，後者是逢迎主義的吧兒魂而已，嗚呼！

野草

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人問：世界上什麼東西的氣力最大？回答紛紜的很，有的說「象」，有的說「獅」，有人開玩笑似的說：是「金剛」，金剛有多少氣力，當然大家全不知道。

結果，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一粒種子所以顯現出來的力，簡直是超越一切，這兒又是一個故事。

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緻密與堅固，生理學家和解剖學者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來，都沒有這種力氣，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裏，給它以溫度與溼度，使它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

了，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這，也許特殊了一點，常人不容易理解，那麼，你看見筍的成長嗎？你看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顆小草的生成嗎？他爲着嚮往陽光，爲着達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它的根往土壤鑽，它的芽望地面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塊，結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種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祇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爲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

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歎氣，因爲有了阻力才有磨鍊。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鬭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祇有

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棚中發育着的盆花哄笑。

掌聲與哀聲

報載：「英國國會在德機空襲中開會，經過了長期「休養」的前首相張伯倫，適於是時出席，保守黨議員一律報之以掌聲」，假如這掌聲祇表示「紳士」的儀禮，那麼這也許是我們異邦人的少見多怪，但假如這拍手表示歡迎或者擁護，那麼，我們以為應請張前首相和保守黨諸員傾聽一下在德機狂轟下挨炸彈的百姓們的哀聲。

我們不能斷定這次歐戰勝的誰勝誰敗，但是大英帝國已經遭受了九百年來未有的危機，他的威望已經顯著地受了傷害，他的子民已經遭受了塗炭之苦，這都是無可掩飾的事實，誰使他們如此的？我想後世的史家總該有個正確的結論。執政的階層，負有政治責任的人，一念之差，一事之誤，往往可以使千千萬萬人民

，淪於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境，紳士們常常愛說「往者不咎」，但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表示對於過去的錯誤可以繼續下去！炸倫敦者希脫勒，使希脫勒館炸倫敦者，除張伯公外無他人，不知既然此老聽到他同黨們拍掌聲的時候，也曾聽過海德公園中千萬人民的怒吼之聲否？

據說，戈林的炸彈已經把英倫的歷史陳列館炸毀了，但是英國歷史上的一個公共的判詞，怕是永遠炸不掉吧。

何必苛責林語堂

曹聚仁先生在「大江日報」副刊「放言」上說，林語堂先生是文人中的巨富，此番到了重慶，本來打算永住，後來因為有人勸他在七七那天義捐一萬元，他便改變初衷，匆匆而去，曹先生對於林大師的這種特殊「幽默」，頗有一點反感，所以「放言」裏面，不無憤憤之辭。

我們不知道林先生的此去，是不是爲了寄一萬元，但是，我倒以爲假如林先生真的有這麼一回事，也不必苛責，不，應該說，在苛責林先生之前，值得責備的還多得很。

即使照曹先生推估，林氏財產也不過五十萬元，五十萬，在文人裏面，當然是鳳毛麟角，但是和眞眞的豪富比較起來，也還有大小巫之別，而且林氏的錢，即使說是「碰運氣」，但終於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換來的，而世界上用他人鮮血勞力，來肥自己，有上千萬，萬萬，而一毛不拔的人，多得很呢。

林氏在美國，雖則他寫的書不一定盡如人意，但他終於還是堅持着抗戰，堅持着團結，在美國人裏面，散播着「中國一定要打下去，而且一定可以打勝」的印象，這一點「微勞」，比捐一萬元有力得多，所以我們倒也希望他看了一看祖國之後，依舊回到國際宣傳的崗位去。

不打老虎打蒼蠅，年來傳爲笑談，那麼不罵瘟官而罵文人，不也是一樣？對於那些「把家財平均起來每個中國人可以得到國幣四元」的人，需要更苛的口誅，

更嚴的筆伐！

送綏靖公之辭

正在德軍大舉進攻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烽烟中，在多事的歐洲担任了三年大英帝國閣揆的張伯倫首相，終於悄悄地退陣了，雖則他辭職之後依舊參加了邱吉爾的聯合內閣，但是在挪威敗戰之後，勝負未決之前，更是由於工黨自由黨的拒絕參加他所領導的新閣而引咎求去，這在高齡七十的張氏，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寂寞的事情。

張氏「在唐寧街十號的最後一次講話」，在心情黯淡之點，將和去年九月三日演詞同樣的使人永遠不會忘懷。在歐戰爆發的日子，張氏曾向全世界廣播：

「今日，在我們大家是個慘淡的日子，但是可以說，將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感到慘淡，一切我所努力的，一切我所希求的，好像一座巨廈一樣，頃刻間被打成

粉碎了」，而在八個月之後，他的演詞却更增了他的慘淡：「受任開揆，緝息三年，在此時期，深信維持光榮和平之機會甚多，故不願輕易放過」，但是現在，他感覺和平已不可得，所以他祇能號召國民「堅強團結，以撲殺此兇殘絕倫的野獸」了。

在這樣一個慘淡的日子來回溯歷史，本來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但是，祇有殘酷的歷史，才是深刻的教訓，那麼，讓我們看一看三年來張氏「維持光榮和平」的機會吧。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張氏辭職之後，在大英帝國，真是一連串的委屈求全的日子，歐洲地圖上，一大羣獨立的國家被消滅了，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奧地利，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捷克，一九三九年三月的西班牙，一九三九年四月的阿爾巴尼亞，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波蘭。這一羣國家遭遇到亡國的危機而還有一個確實安全可以保衛的時候，張伯倫的態度是堅定的，祇是，他的堅定是站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大眾之願望的反面！千萬人呼喊著，祈求著，鬭爭着的口號，「用集

體安全嗎？來保衛民主和制裁侵略」曾不值張首相的一瞥。今天，他將希特勒叫做「予人類歷史以最大禍害」的「兇殘之野獸」了，可是，三年以來，當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將希特勒定義為「侵略者」的時候，張氏是堅信着希氏是「維持光榮和平」的協力者的，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恥辱的日子，張伯倫在貝樞特却登和「兇殘的野獸」握手，宣告了捷克之死刑，那時候，張氏帶着笑容的。一九三九年七月，德國對波蘭躍躍欲試，勞合喬治在下院大聲疾呼非英法蘇聯合不足以制裁侵略的時候，張氏是用近於粗魯的言詞回答了喬治的，對於他的那種「堅定」的縱容德國，峻拒蘇聯，犧牲弱小，「維持和平」的政策，那是今天擔任新聞揆席的邱吉爾也是不恤以一切尖刻的言詞來反對過的。犧牲捷克的宣言發表之後，邱吉爾冷酷地說過，「據說英法政府不能不在戰爭和屈辱二者之間選擇其一，但是，我說，他們選擇了屈辱，可依然免不了戰爭！」結果，一年之後，邱吉爾完全說中了。

當英法蘇談判瀕於破裂，張伯倫表示單獨保證波蘭的時候，勞合喬治拍案大

罵，說：「假如說沒有蘇聯可以保證波蘭，那麼我們參謀本部的官員一律應該到瘋人院去休息」，張氏冷笑不答，而三個月之後，喬治的話又不幸而言中了。

今天，我們驚愕於德國的強大，悲嘆於丹麥，挪威，瑞士，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國遭際的慘淡，而使德國強大，使這些企圖破滅的這一個政策的實行者，却孤影悄然地從唐寧街十號消失了，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這是妥協政策的必然的結果。

今天，張伯倫是飄然地離開了唐寧街十號了，但是全世界的大衆，却不能同樣飄然地離開轟炸和屠殺的戰場！

殘忍的根源

香港報上載着一段閹割社會的大婦殺妾消息，據說那天開審的時候，法庭前而擠得水洩不通，大家都要看一看這位「女主角」的廬山面目，開審時，英籍法

官問到爲什麼要殺死那個侍妾的時候，犯婦回答：「她是一個婢己」，英國人不懂，說：「什麼叫做婢己」？於是聽衆哄堂大笑，問官把驚堂槌一拍，說「有什麼好笑，你們不知道已經死了三條性命了嗎？」——我想，這是一個表面滑稽而內裏沉痛的故事。

中國人愛看殺頭，喜歡聽殘忍的故事，舉凡一切別人不幸的事，都歡喜去看一看，於是外國人說中國人殘忍野蠻，中國人也自歎無測隱之心。

真的中國人是天生殘忍的嗎？我想每個人都要否認，那麼這種心理從那裏發生的呢？我以爲由於二重三重地壓迫着的生活，自己過着牛馬奴隸的生活，而又盲目地，找不出使他們受難的原因和找不出真真的敵人，於是心理異常，變成需要發洩，遇到別人不幸，好像感到刺激和興奮。高爾基前期小說中描寫的那些被虐待者的心，和我們現在所目擊的沒有兩樣。

肅清殘忍心理，要解除殘虐生活。

論「晚娘」作風

舊小說和文明戲中，常常描寫晚娘（後母）的虐待前妻兒女，「晚娘的拳頭」，在舊社會中被認為刻毒事情的象徵。

其實，晚娘對前妻兒女的刻毒，不單單在於打罵，晚娘在暗中打罵「兒女」，而表面上對丈夫，對鄰人却要特別表示得和善和愛惜，這樣，才可以不傷體面，而完成她「統制」的實際，我們在台下看「晚娘戲」的時候，在她毒打兒女的時候所感到的是悲苦，可是當她一面毒打而一面反用一只手按住了孩子的嘴巴不讓他哭喊的時候，感到的就會是無邊的憤怒。

當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兒女，讓她繼占，他方面可仍舊要敷衍她的丈夫，鄰居，而博得一點名譽，所以她主要的作風是「一面瞞，一面打」，——事實上歷來晚娘慣用的方法，往往是陰性的虐待，譬如餓

獨，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這些討厭的小東西明明白白地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計劃着使他們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沒有殺人罪，屍身上沒有外傷，手乾腳淨，丈夫和鄰人看了沒有閒話，也許當死的那一瞬間晚娘還可以擠出一點眼淚，來點綴一下昇平。

中國人懂得晚娘哲學，學會了「一面誇，一面打」的方法，這種作風一子家傳，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頑劣一點，從指縫裏漏出一點喊聲，那就打得更兇，或者簡直處死，因為這就構成了有罪，「損害了晚娘的尊嚴」。

晚娘作風，滔滔者皆是，而今而後，被打而又不肯不哭喊者，其將永無噍類乎？

文人無「行」

中國有一句罵文人的話，叫做文人無行，意思是說文人沒有品行，假使這個「行」字真是作品行的行字講，那麼這一句話實在很不公允，因為文人無行的固然也有，有行的恐怕要比無行的多些，正面說，古今堅貞不拔之士，大部分都是文人，反面說，做官的，業商的，恐怕無行的也很不少，可是並無人說「官人無行」，「商人無行」。

所以我以為文人無行的「行」字，並不作「品行」的行字講，這「行」字假如解作「行動」和「實行」的行，那麼用於中國文人，纔是十分恰當。中國文人和別國文人比較起來，實行力實在太差，只能講，不能「行」，這是事實。

批評別人的時候頭頭是道，輪到自己的時候便說「我幹不來」，當他說幹不來的時候，多少的還帶着點潔癖的驕矜，這些事不是文人幹的，文人是用腦的，

「跑腿」不是文化人的事情。

於是而造成了腦和手不能呼應，思想和行為脫節的現象，文人被人看作「書獃子」，看作不切實際，不明世務的人，原因在此。

新的文人應該是「行動的人」，要能夠講到做到，說到辦到。蓬首垢面，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處理的封建文人的時代，早該過去的了，像恩特萊，馬洛一樣的奮迅果斷的人，才是新文人的典型。

哀王開疆

報上登着「王開疆自殺明志」的消息，看了有點黯然。黯然的原因不是爲了可惜這個替汪逆做過狗的王開疆，而是從王的死，反映出中國了文人氣節的墮落。

王開疆自殺的時候，他自己說是因爲「無顏洗刷」，所以覺得「像我這種人

，只有跳海才能洗淨我清白之身」。他終於跳了海。王開疆的過去，我們不知道，大概總是汪賊的蝦兵蟹將之類吧，或者是上了汪賊的當，或者是受用了敵人的錢，死無足惜，這是一定的，但是他，還知道只有跳海才能洗刷，而他作惡更多，對國家民族爲害更大的王八狗蛋，却正在大寫文章，表示洗刷，不，他們那里是洗刷，簡直是以「曾經附逆」爲資本，大做其升官發財的勾當，文人墮落至此，可哀孰甚！

王開疆的死，是對於那些做了漢奸又圖洗刷的人的一個極大的諷刺。文以哀之。

文藝生活叢書

轉形

司馬文森作
定價三元

這是司馬文森先生第二個中篇小說，寫的是南戰場某戰區，我們的某一部份抗戰部隊，怎樣從腐蝕的封建式的統治，蛻變而成為勇猛的抗戰新軍；寫我們在南戰場的軍事，如何從廣州失守，轉變到粵北大捷；如何從退守到反抗，是一部史詩式的作品。作者從抗戰爆發後，即參加抗戰戰區工作，耳聞目見，累積多時始成此書，是他繼「天才的悲劇」後光輝的作品。初稿完成時曾在「國民公論」上連載，雖因「國民公論」停刊而中輟，但已深得廣大讀者之熱烈歡迎矣。

蕭

伍禾作

定價二角

「蕭」為伍禾先生之千行長詩，寫的是一個革命者顛沛流離的一生，在「文藝生活」發表時，曾深得廣大讀者之歡迎。現經作者細為修正後，交本社發行單行本，預料此書將為一九四五年最暢銷的詩作。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野草叢書之一

此時此地集

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外埠郵費另加

著	發行人	發行	經售	印刷者
夏衍	夏衍	文獻出版社	各大書店	國光印刷廠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三版

6.9

3-4